

是时候了,我们干些什么吧



阿乙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年2月

“我得找点事情干。”

这句话,是解读《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乃至所有阿乙小说的一个入口。

对于作家本身来说,这无疑也是创作的始发站:找点事情干,譬如写作,来砍杀时间,赋予生命些许意义。当然,对更多的人来说也没什么不一样——农民造飞碟、按摩师研究永动机、上班族背包旅行。至于这个事情究竟是什么,其实没什么要紧,重要的是要干。

“得找点事情干”的目的,是试图将灵魂从日常生活中搭救起来。文艺腔的表达可以用这样

一个比喻:一根选择燃着的火柴,即便最终烧成炭灰,也好过其他整齐排列沾着黄磷的木棍儿。

人做些出格(相对日常秩序而言)的事,无非是为速朽的肉身留下些稍微长久的痕迹。阿乙在《鸟,看见我了》的自序中也表述过这个意思。至于随后那句“哪怕只有一季稻子那么长”,不过是撒娇式的后缀。此种欲望,一如熊猫将尿液洒向灌木和竹丛,或者游客在慕田峪长城刻上到此一游的字样。泰戈尔有个流传很广的句子:“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而我已经飞过。”面对没有翅膀痕迹的天空,所以意义就是“飞过”这件事儿曾经存在。

从《鸟,看见我了》到《下面,我该干些什么》,那些庸常生活中的面目不清的人,或者民哲、民科这些现世彷徨的格格不入者,通过和日常有显著区分的、和职业身份差异化的方式,在暗夜里点燃火把,获得另一个生机勃勃的自我。

这种自我寻找和获得虽然是隐秘的,几乎不为其他人所知,但却是一个人区分子另一个人的最本质所在。如果不能“找点事情干”,在精子和卵细胞到火化后的

有机物大分子之间的这段经历,没什么可以证明确实存在过。

《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中的无原因杀人,正是自我寻找和获得的表达。只不过这种“七宗罪”式的情节,类似于鳏夫拐走洛丽塔,突出了令人不安的惊世骇俗,导致了阅读的错愕或惊喜。然而这文字中瞧出来的善恶不过是倾向,而非判断是非的坐标。

从题材来看,《下面,我该干些什么》依然是部涉案小说,和阿乙以前的大多数作品类似。依赖于前片警的生活体验,提供碎片和细节。但题材不过是表象,就像衣服之于人本身——小说的内核是个人如何打破自身和生活达成的苟且。这是文学的一个历史久远的母题:荷马描写伊阿宋寻找金羊毛,王小波让李靖研究高等数学,垮掉派诗人沿着公路流浪,格瓦拉钻进丛林闹革命,甚至是今日的穿越肥皂剧,都是一回事。

通常来说,作家类似全自动洗衣机,读者只看到他不断拿出光鲜漂亮的衣服,却无从知道浸泡、纠缠、消毒、甩干的艰难过程。阿乙在这个小说上面纠缠了几年时间,数易其稿,先后改了几个名字,最后才定为《下面,我该

干些什么》。我几乎阅读过阿乙所有完成的作品,以及更多的半成品,还有更多的残次品。每次写完一部作品,阿乙都是满脸衰败,望去如全体青壮都去打工的乡村。

有一个笑话,蚂蚁伸一条腿,想要绊倒路过大象。在常识里,大象不可能被蚂蚁绊倒,所以那只蚂蚁成为被嘲弄的对象。但我关注的是另一件事儿:那只蚂蚁为什么会试图绊倒大象,并且勇敢地伸出腿来。

如果将作家等同于想要绊倒大象的蚂蚁,那些虚构的文字无疑就是伸出来横在路上的腿。虽然纤细得可以忽略不计,但正是这种用写作抵挡庸常生活的尝试,拯救了小镇青年艾国柱。写作燃着木棍,成了照亮黑暗的火柴。

如今的阿乙,和现实生活的关系已经大大缓和。虽然很多朋友为他的写作忧心忡忡——警察经历的矿藏总有一天会采掘殆尽,接下来应该写什么——但对于阿乙来说,写作的题材其实不是问题,他需要解决的是如何克服“过于频繁的自我否定”,将每次转变以慢动作的速度体现在作品中,而不是自己在思考中不留痕迹地翻过。

董琳

新书推荐
New Book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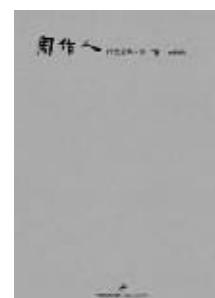
《石泉城》



2012年2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理查德·福特 著

美国短篇小说大师福特的短篇小说集,10篇小说,10个故事,在每一个故事中,一生的悲伤都是在一个转瞬即逝的念头、一个发现、一次纷争之后突然形成,给读者留下久久萦绕不去的印象。

《周作人译文全集》



2012年2月
上海人民出版社
周作人译止庵编订

全书共十一卷,汇编目前所见周作人所有将外文译为中文的作品,近三分之一内容自原书首版之后数十年来持续绝版,极为珍贵。其中第一至四卷为古希腊文译作;第五至八卷为日文译作;第九至十卷主要为英文及世界语译作;第十一卷为用文言文翻译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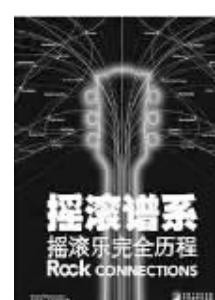
《我的妹妹,我的爱》



2012年1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
[美]乔伊斯·卡罗尔·欧茨 著

本书源自美国一起至今尚未告破的著名悬案,1996年圣诞节当天,一名六岁女孩在家中的地下室惨遭强奸和杀害。受真实案件的触动,欧茨基于想象创作了这部小说,试图艺术地表现当时可能发生的一切。本书顺利成为2009年IMPAC都柏林文学奖的入围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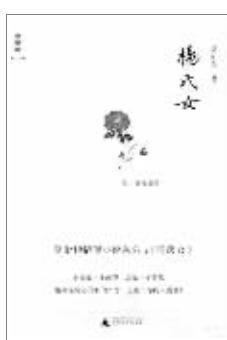
《摇滚谱系》



2012年2月
中央编译出版社
[美]布鲁诺·麦克唐纳 著

这是一本实用指南,也是一场视觉盛宴,用细致动人的情节、珍贵并独具代表性的图片和精彩犀利的语言细数摇滚舞台上轮番登场的各路明星,详细梳理音乐大牌们走过的音乐之路。

生命是一个故事,还是事故?



章诒和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年1月

从《刘氏女》到《杨氏女》,看得出来,章诒和女士对于小说题材和语言的把握,已经有了一些驾轻就熟的感觉。她找到了一种属于自己的叙述和表达方式,尽量以一种冷静的、不露声色的文字,来挖掘人性深处暗流涌动的复杂本质,揭示灵魂的悸动和原始的本能。显而易见,多年的牢狱生活之于章女士已不仅仅是一种刻骨铭心的苦难,同时也转化成一笔丰厚的资源。而小说描写的女囚——刘氏女也好,杨氏女也罢,抑或还有即将动笔的邹氏女,在章女士笔下,她们都不再只是一些简单的人物形象,亦已超越了“好人”与“坏人”的概念。她们其实象征着人性无可调解的深刻矛盾,象征着女人的本能和天性,在一种畸形社会环境里的扭曲表现。

生命是一个故事? 还是一个事故? 这虽然是章女士在《杨氏女》中设置的一个疑问,但是,她其实已经通过小说的故事作出了这样的回答:生命不是一个故事,而是一个事故。像许许多多的正逢青春花季的平凡少女一样,小说中的杨氏女美丽、大方,憧憬理想的爱情,却又不乏现实的虚荣。按照常理推想,如果像一般人那样安于现实生活,即便在那个年代,她也应该有一个不算太差的结局。但是,理想爱情与现实婚姻之间的矛盾,却彻底改变了这个平凡少女的命运。杨氏女命运的转折点,即在于她主动爱上了地主的儿子,却又被动接受了带有功利色彩的现实婚姻——前者令她灵魂出窍、无法自拔,后者则成

为她生命中的一道伤口,绝难弥合。这种飞蛾扑火一般的爱情,最终演化为一场鲜血飞溅的通奸情杀悲剧。

虽然经过了多年的牢狱生活,但章女士一直未改理想主义的初衷,这在她的小说中同样看得分明。对于性爱,章女士曾经这样说道:“在当代生活中,生殖目的的确不再是目的,甚至爱的目的也无绝对之必要。它可以是一种游戏,一种单纯享受,可长期可短暂,可多次性也可一次性。”由此不难窥出她的小说的倾向性——她同情杨氏女的遭遇,理解和接受杨氏女的所作所为——包括杨氏女与邻家青年的热恋与身许,与监狱指导员的偷欢和苟合。她甚至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看待杨氏女的爱情选择。她说:“有罪的相恋,也比干净的夫妻要好。”

但是,理论上合理的东西,现实中却未必行得通。所谓“尘世至繁,天地至简”,与复杂的社会环境相比,单纯的爱情,固然可以简单到能够让人毫无顾忌地抛开一切,

然而,再简单的爱情,也依然无法脱离现实环境而独存。所以,性爱是个人权利,却又并不单纯属于个人权利,把属于个人的权利归还给个人,在那个时代属于一种遥远的梦想,即便到了今天,也依然是一种遥远的梦想。章女士本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她才会这样说:“他们是罪犯,罪不可赦。但我喜欢他们,我也是罪犯。”

平心而论,站在小说的角度而言,《杨氏女》虽然的确不无令人震撼的情节和故事,但我觉得,它仍然更像是一部主题先行的小说——作者在动笔之前就有了明确的主题设定,她显然更关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她描写的小说人物,也只是为了进一步印证自己的内心世界。以致到了小说的下半部分,杨氏女的故事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作者本人则时时化作小说的人物现身说法。我个人以为,这种写作手法,若从方便叙述的实用性出发,尚可以理解;但站在小说艺术的角度上考虑,却并不是取。

慧远

用三种方式解读罗兰·巴特



埃里克·马尔蒂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年12月

作为20世纪法国思想界颇有影响的知识分子,罗兰·巴特被人们冠上了许多评价,如“继萨特之后法国知识界的领袖人物”

“蒙田之后最富才华的散文家”。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发表的《写作的零度》起,罗兰·巴特就以其新颖的见解、睿智的话语闻名,而在其之后发表的诸多著作中,他在实现其作为批评家的价值的同时,也逐渐架构起一个新学科即符号学的大厦。他对后现代主义影响巨大,其辐射范围包括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诸多领域。就是这样一位富有个性的学者,巴特的生活、思想都有足够吸引人的地方,巴黎第七大学教授埃里克·马尔蒂的《罗兰·巴特:写作的职业》无疑是为读者揭示巴特的世界的一扇重要窗口。

巴特曾这样说过:“如果我作

为一名作家逝去,我多么希望我的生命,通过一位善意的、洒脱的传记家之笔,浓缩为几处细节、几种味道、几种曲折。”如其所愿,本书的作者埃里克·马尔蒂正是按照巴特所希望的风格进行写作的,没有系统的详细叙述、没有复杂的实证、也没有长篇的议论,作者完全通过自己与巴特交往的回忆、巴特生活中充满意蕴的细节及自己对巴特思想的独特的感悟来对巴特的生活及著作进行解读,整本书内容看似如天空的缕缕浮云,实则十分到点。如作者所说,书中通过三种解读方式来解读巴特:对其生活的讲述,对其著作的综观、对《恋人絮语》的阐述。之所以要如此展现巴特,作者认为,这是为了

证明“写作的职业”是作家巴特的生命的表达。在他看来,巴特的学术生涯可以分成三个时期,即《写作的零度》《神话学》时期的批评家巴特,《流行体系》《符号的帝国》时期的结构主义者巴特,《恋人絮语》《明亮的房间》时期的作家巴特,而作家巴特是巴特最后的归宿,也是最惬意的定位。

该书的价值在于其独特性:独特的视角、独特的语言、独特的对象。通过这本书,相信读者不仅会认识一个与众不同的巴特、近距离的巴特,更能通过罗兰·巴特这一极具个性的存在,了解20世纪法国知识界之片貌。仿用该书作者的一句话,巴特无意占有读者,而是任由读者攫取自己。

叶仁杰